

中国：改革·发展 与稳定

〔美〕 杨叔进 著

吴敬琏 季崇威 荐

中国发展出版社

· 北京 ·

总 序

鲁 志 强

“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在一个人口超过非洲和拉丁美洲人口总和的国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瞩目的发展”。这是世界银行在其《202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研究报告中对中国的一段评价。其实，这个“最令人瞩目的发展”一直是几代中国人执着追求的世纪之梦。为了这个梦想，中国人为之百年奋斗，付出了无数的激情和牺牲；为了这个梦想，中国人为之百年求索，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失望；为了这个梦想，中国人为之百年学习，视野遍及西方、东方、北方。直到中国共产党人才把这一梦想变成了理想，直到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寻求到了一条强国富民的正确道路，中国才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开始把这一理想一步步变为现实。我们正在完成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转型，正在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宏愿。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转型，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一个富于挑战的、艰巨的、充满风险的任务。何况我们是在一块承受着太多人

口的古老土地上，是在一个长期贫弱、饱受欺凌的国家里同时经历两个转型。“单是指令向市场的转型就是变幻莫测的：人们亲眼目睹了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崩溃。同样，从乡村型的农业社会向城市型的工业社会的转型也有许多风险。在富裕的工业国家中，这一转型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而在中国，这一进程被缩短到一代人或两代人的时间。”世界银行在同一报告中如是说：“（中国正在经历的）这两种转型的合力，产生了强大的旋涡和逆流，他们是可能破坏稳定的潜在因素，而且总是难以预测”。认为“中国在快速增长和结构变革中将会引发的一些新的难题：由于尚未完成的改革所造成的宏观经济不稳定阶段；就业和收入无保障状况的增加；尤其是在城市地区日益增大的环境压力；粮食自足成本的不断上升；不平等日益严重和根深蒂固的贫困；以及棘手、有时是敌对的国际环境。这些都是严峻的挑战，如果不加以解决，它们就会破坏增长的可持续性，而中国的前途也可能会黯然”。这些预警式的判断，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思。

我们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一方面，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正在步入信息化、全球化，改革的浪潮遍及世界所有国家。人类从来没有取得像今天这样的成就。世界经济迅速发展，有人已在议论世界性的“生产过剩”问题。但1997～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再次暴露了今天的经济制度存在着巨大的缺陷，现有经济体系的合理性面临着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几个投机家就可能影响全球的经济景气，甚至触发世界经济衰退的现实，不能不让所有人认真反思和考虑，21世纪应该怎么办。要解决这样的全球性体制问题，没有全球的努力是不可能的。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需要相互协调、相互合作。另一方面，人类在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同时也从来没有面临像今天这样多的问题：人口问题、生态环境

问题、资源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等日益困扰着人类。人们不能不对过去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提出疑问，并因而提出了争取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但要实现这一战略，真正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理想境界，没有几代人的努力恐怕是难以成就的。步入21世纪，有人形容人类的处境是：面临太多的问题，太少的答案。但历史已经证明，问题太多的时代就是人类即将进入有所突破的新时代。关键还在于人类自己。

要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有独立探索的精神，也需要有学习、吸收和借鉴全人类思想精华的胸襟和能力。我们希望能为此贡献菲薄之力。为此，中国发展出版社决定组织翻译出版“发展译丛”。

这套丛书的选编和翻译与一般的译著相比，有这样几个特点：

1. 这套丛书不是由名家或权威人士预先选定书目，再约请名家翻译定稿的，而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或其他机构的研究人员，在日常的研究实践中，从令他们眼睛为之发亮、深感开卷有益的新书中选定的。他们的眼光也许稍嫌稚嫩、短浅，但所选书目却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切身体会和感受。可以推测，对这样的研究人员认同的这样的著作，应该是值得关心中国经济问题的读者一读的。

2. 这套丛书的译者大都是推荐者本人，且大都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其他国内著名机构有为的年轻研究人员。他们的文笔也许还不够老到、优美，且难免有贻笑名家的败笔，但他们对于所选著作既有着良师益友般的知音之情，又有着对所译著作的拳拳慈母之心。他们愿意让所有和他们一样有使命感、责任感、参与感的读者一起分享他们的所得、所思、所求。这样的心情，应该会得到读者积极的反响和共鸣。

3. 这套丛书的选择和出版完全是开放的，它的书目、译者和出版都没有预先严加设定。我们愿作这样一种尝试：希望紧紧围绕中国现代化、市场化的进程，紧紧把握世界经济学的发展脉络，紧紧追随研究人员的思维和研究实践，不断增选新著作，不断组织新译者，不断扩充丛书内容，不断提高丛书质量。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呈现一种鲜活、求实的风格，一种淡泊、扎实的品位，一种负责、平实的境界。

我们的水平有限，眼界有限，能力有限，所为不一定能达到所思。但我们会以负责的态度，敬业的精神编译出版好每一本书。我们欢迎读者的批评指正，期待读者的推荐和建议，衷心用更高的水平回馈读者。

序言

2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为全世界所瞩目，更被海外华人、华裔尤其是学者所关注。他们中不少有识之士，对祖国这一历史性的巨大变革和辉煌前景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他们亲自参与研究，或撰文介绍宣传，或出谋划策，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供政府和学者们参考。杨叔进博士就是锲而不舍的最热忱者之一。

杨叔进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大，留美获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博士。早年曾任职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经济调查处、计划处处长和高级经济专家。后转入世界银行，任高级经济专家。曾多次担任世界银行经济考查团团长及成员，考察了亚、欧、非、拉美十余国的经济，并提供咨询，还曾任菲律宾国家经济委员会和泰国政府短期顾问。在台湾经济起飞过程中，他也曾被邀请提供过咨询建

议。这些经历，使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点和成长历程非常熟悉。他运用了造诣颇深的国际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得心应手，成效显著。

80年代初，他负责主持世界银行与联合国开发署在中国合办的经济管理培训项目，致力于培养中国的高级经济管理人才。退休后曾任世界银行顾问，多次回国考察大学财经教育和讲学，并担任过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顾问教授及中央财经学院等校名誉教授。

杨先生对祖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非常关心，80～90年代，几乎每年都要回国参加会议，进行调查研究，与经济界学术界友人交谈。我是他每次来北京时必定见面的知友之一。在谈论中，我常向他请教若干宏观经济和金融、外贸、外汇等方面的问题，得到他精心的指导和圆满的答复，使我获益匪浅。杨先生在担任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期间，对我国外贸体制改革作了深入的调研，写了《中国外贸体制改革》专著，于1998年出版。十余年来，他还在国内外报刊上撰写发表了50余篇介绍评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文章。对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应接受的教训和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当务之急，都有精辟的论述。他对东亚开放式工业化与区域合作，也作了探讨。1989年曾在香港主持有九个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和台湾省）的制成品出口讨论会，在会上作了总结性发言。他认为：“这九个东亚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和地区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出口阶梯的不同层次上，其经济的多样性足以表明该地区内部贸易将持续和迅速地增长。它们在反对保护主义和地区主义方面的共同利益是建立地区密切合作的纽带。东盟在继续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可以参加新的具有同样利益的地区性贸易组织。扩大亚太

地区合作的范围，把工业化国家纳入进来，这种努力可能会因为利益太分散而难以付诸行动，但它可以发挥一个论坛的作用。东亚九个国家和地区不妨加入以追求其自身的利益。”杨先生的这一主张，在90年代成立亚洲和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后实现了。

总的来看，杨先生有着深厚的经济理论基础，通过对众多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实践的长期考察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对中国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战略及政策，常能提出客观中肯的分析评价和求实可行的建议。杨先生以其爱国之情，报国之心，虽届80高龄，仍孜孜不倦期望着祖国的繁荣和富强，并将他的论著整理出版，令人感动。我读后，感到深受教益与启迪，相信广大读者，定能从中获益。特抱病为之作序。

季崇威

1999年4月

序言

杨叔进博士于1949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后，即应聘在设于泰国曼谷之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经济研究处工作。

1954年2月，亚远经济委员会第十届年会在锡兰举行，本人首次奉派以代表身份前往参加，因此得识杨博士，迄今算来已有45个年头。杨博士服务于经济研究处，对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情形了如指掌，本人也常向他请教台湾工业经济发展应走的方向及策略，他都能给以确切的指点。

杨博士的工作是协助亚洲及远东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本人的工作是要发展台湾经济，大家志趣相同，而且又都是中华民族，所以自然成为莫逆之交。

1963年他改去美国华府，服务于世界银行，负责东亚国家的经济工作，他常带领经济考察团到台湾访问，我们便有晤面的机会。我要去华府公

干，也必定去他府上享受中国式的早餐，顺便向他请教世界性的财政、金融、经济发展的趋势。我们差不多每年都有握谈的机会。

1971年3月，杨博士像往常一样地带领一个9人考察团来台湾访问。鉴于台湾经济已起飞，他在考察团成员中请了一位工业专家和一位人口与社会保险专家，对台湾今后的科技产业及社会发展提供建议，可见杨博士对台湾各方面发展关怀之情和用心甚深。这一次也是杨博士最后一次代表世界银行率考察团来台湾考察，因为在这一年秋天，世界银行工作方向转向中国大陆，杨博士就不再率团来台湾。那时，我因为担任财政部长，仍每年以世界银行理事身份前往华府参加年会，亦仍得与杨博士晤面请教。

1978年中国大陆改采改革开放政策，并即加入世界银行，杨博士随即经常奉派访问中国大陆，从此很少能因公务来台湾访问。

1986年杨博士在世界银行服务23年后届龄退休，翌年（1987年）在天津的南开大学设立国际经济研究所，他应聘担任首任所长，每年往返于美国与中国大陆之间，由此可以概见他对大陆改革后之发展了解至深也。

兹杨博士已退休在美定居，有意将其有关中国大陆改革后经济发展之著述结集出书，以免散失，以为研究大陆财经发展之参考文献，书名定为《中国：改革·发展与稳定》。本人认为此书对了解中国大陆20年来之改革，极富参考价值，谨缀数语以为推介，以为本文集之序。

李国鼎

1999年仲春于台北

本序言作者为英国皇家学会蒙得研究室研究员，是台湾经济起飞时主要推动者之一。

自序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一段漫长、艰危、坎坷和崎岖的道路，几经转折，才开始改革。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中国已改革了20余年。现即将进入21世纪，究竟中国改革开放已达到了什么程度，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影响如何？需要慎重思考。与此同时，鉴往知来，展望趋势，还要指出未来的方向，以免再走弯路。

本书不是一个开始即有计划的、全面性的著作，而是就改革、开放、发展和稳定诸问题作重点的讨论。事实上，概括、全面的讨论，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社会与经济问题十分复杂，绝不是一个人所能胜任的。本书所讨论的是改革以来的主要经济问题，每一部分的各章尽可能保持时间顺序。但为了加强联系和进行系统性的论述，又加了新写的一章综论。

作为华裔海外经济学者，笔者的论点当然受到他的学历与经验的影响。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可能有些不利之处。第一，他们没有生活在计划经济社会里的亲身经历，很难体会到这种体制的细节的运行和改革过程。第二，很难汇集到中文书刊，因此可能忽略了国内经济专家的重要贡献。笔者生活在海外60余年，但是出生在东北的农村，长在小镇，求学在大城市，对中国的旧社会早有体验。少年时代也涉猎了维新、革命思想和新文化运动以及中国历史，并亲身经历过八年抗日战争和复员。中美建交后，于1979年第一次返回祖国。目睹同胞的贫困落后，忧心如焚！因为所学和所做是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工作，更觉得“匹夫有责”。曾如台湾某政要所说：一辈子帮助别的国家发展经济，为什么不能帮助自己的国家？

1980年参加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第一次正式考察中国经济，以后因为世界银行的业务和讲学，每年至少要去大陆两次。1987年任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后，每次在大陆停留的时间亦较长。这些年里与各方的交往颇多，增进了我对中国经济情况的了解。对我发表的谈话和文章，一般的反应是“熟悉中国情况”，“有针对性”。有的朋友希望我把这些谈话和文章编写成书。我想这本书也不至于是无的放矢。

在国外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也有一定的有利条件，即更能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与分析方法，不太受意识形态的约束，也可能更多地知道他国经济发展经验。因此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判断和见解，可能跟国内的角度不同。如能因此刺激思考，加深论证和帮助从实践中检验真理，倒也是件好事，并非“离经叛道”。

笔者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及世界银行工作36年，亲自考察过20余个国家的经济，并提出咨询意见。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等，混合经济国家印度、巴基斯坦、缅甸以

及实行市场经济的“四小龙”等（参看附录一及附录二）。审议过50余国的经济发展策略，这些经验都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诊断”中国的经济问题。说“诊断”是有来历的。台湾原经济部和财政部部长李国鼎先生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功臣。在我作为世行经济考察团团长访问台湾时，他曾对我说：“世界银行的经济代表团好像是家庭医生，每隔一两年来考察经济，就像检查身体一样，看脉搏是否正常，体温是否过高，血液循环是否通畅，肠胃消化是否良好等。如诊断出毛病，便开药方医治，使身体可以健康运行，生机勃勃，逐年成长。”

由于笔者的背景，书中的观点可能与国内一般看法有“不一致”的地方，听来可能不太顺耳。一位学生记者曾对笔者作下列评论：“先生直率，不愿盲从，不苟流俗，故其观点往往初闻之逆耳，但继之则知其然，且每每为实践所最终确证。先生在1983年就指出，中国的‘六五’计划工业增长率及GNP增长率都定为4%，是‘太过分谨慎了’，‘太不切实际了’，‘能轻易达到或超过的目标，不能发挥经济潜力’，‘采取过低的工业增长率指标并因此而计算出基础设施（如交通、电力、能源）的需求和发展速度只会过低，并使这方面的‘瓶颈’变得更加狭小。”这已被实践所证明。“今天痛斥‘诸侯经济’，疾呼‘全国统一市场’的人们，也不应忘了1988年5月30日先生所指出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权力下放，很大一部分是把投资权和企业主管权下放给地方，这是非常值得考虑的’，以及杨先生对地方因局部利益而‘实行对外封锁原料和市场，甚至用行政命令割断企业间的横向联系’、‘地方权大了，企业权就会缩小’的精辟的批判性分析……以上随拾数例，相信人们不难窥管见豹，知先生腹中锦绣深藏”（载《山西发展导报》，1992年12月25日）。本书如有冒犯之处，只能说是“赤子之心”；如有新意，而被作为决策

者或学者参考之用，则幸甚。

本书的编写得到李国鼎先生的鼓励，并为之作序，特为铭谢。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季崇威先生和世界银行华尔诚及温英干两位博士提出宝贵的增修意见，甚为感谢。

作者又特别感谢季先生对本书出版所给予的鼓励与协助。季先生是我受益最多的国内知名经济学家之一。我每次到北京，他必来访长谈。他曾两次介绍我参加深圳的中外专家中国十年改革会议和在江阴举行的乡镇企业会议，得以接触各方人士，增进对实况的了解。他也常介绍我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他的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对中国的经济情况了如指掌。从他那里我学到不少。有此知交，甚为幸运。这次他和国务院发展中心的吴敬琏先生共同推荐此书出版，在此特向两位先生再次致谢。同时也感谢中国发展出版社社长朱兵先生的热心支持和译丛主编鲁志强先生的协助。笔者在过去20年中也曾向许多国内经济学家请教，获益良多，在此一并致谢。因篇幅关系，恐挂一漏万，恕不能一一提名。

最后，我要对我的妻子郭开华女士表示由衷的谢意。她为此书出版作了大量的工作和努力：提出宝贵建议，担任抄稿、电脑打字、核对、复印等烦琐的工作。由于她的全心全意的支持及不遗余力的协助，使得此书得以及时成形问世。

本书是笔者的一得之见，不妥之处，尚望读者指正。

作者1999年4月28日
于美国华盛顿近郊

目录

自序	1
综论：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世纪之交 的回顾与展望	1
0.1 改革的经验	2
0.2 发展与稳定	10
0.3 问题与展望	20
0.4 结语	33

第一部分 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 与所有制的演变

1章 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探索	39
1.1 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39
1.2 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和改革的必要	41
1.3 中国经济改革的主导思想和路线的演进	44
1.4 结语	47

2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形成与实质问题	49
2.1	引言	49
2.2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三要素	50
2.3	计划经济的市场化	51
2.4	公有企业制度的转换	56
2.5	按劳分配如何实现	66
2.6	结语	72
2.7	伸论：社会主义的真谛何在	73
3章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与战略	78
3.1	国有企业在转型期中面临的严重问题	79
3.2	中国政府提出的国有企业改革方向	83
3.3	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与问题	85
3.4	私有企业的发展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至关重要	97
3.5	行业、竞争性及所有制：国企改革全盘战略棋局	101
4章	中国行政机构改革方案的评析	107
4.1	背景	107
4.2	行政机构改革的原则	108
4.3	行政机构改革内容的分析	109
4.4	展望	111

第二部分 增长与稳定的相关政策

5章	80年代经济发展与改革政策主题的评论	117
5.1	增长与效益	117
5.2	计划与政策	122
5.3	物价与市场	126
5.4	对外开放政策	132
6章	价格改革、通货膨胀与宏观经济管理	140
6.1	宏观经济管理	140
6.2	通货膨胀与体制改革	146
6.3	“治理整顿”及财税政策	150
7章	1989年调整人民币汇率的建议	156
8章	财经教育改革与高校“创收”质疑	160
8.1	财经教育改革	160
8.2	高等院校“创收”质疑	162
9章	改革、放权和“九五”计划 中的地区发展问题	166
9.1	引言	166
9.2	体改过程中放权的经历与内容	166
9.3	地方经济权力下放的效果	167
9.4	“不规范”的放权所带来的问题	168